

2

# 蔡德金著：《汪精衛評傳》

王 克 文\*

書 名：汪精衛評傳  
作 者：蔡德金  
出 版 者：成都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時 間：1988年4月  
頁 數：493 頁。附圖。張靜如序

這本書是多年來第一部用中文撰寫的學術性汪精衛傳記，作者又是研究汪政權卓有成就的專家，因此相當值得注意。

全書十二章（第十三章「結束語」不計），敘述抗戰時期汪氏主和通敵及組織偽府的就佔了六章，就頁數言更在一半以上。這固然反映出作者的興趣與功力所在，但作為一部完整的傳記，未免不够平衡。在汪氏的六十一年生涯裏，主持所謂「和平運動」的最後六年僅佔十分之一，也不足以代表其政治事業和性格的全部，故此書的頭輕腳重是一明顯的缺點，應先指出。

全書的結構既然如此，有關汪氏在辛亥革命前後活動的第一、二章，自然甚為簡略。其實此一時期（1905~12）長達七年，在汪氏政治性格的形成過程中，極關緊要。如1910年汪氏因謀刺攝政王不成而被捕入獄，1911年出獄後又在同盟會及袁世凱之間調停奔走，便是他「浪漫衝動」和「現實妥協」兩種極端性格的交互表現，值得作進一步探究。作者在這一段裏比較重要的論點，是認為汪氏在辛亥革命後的調停活動，係代表同盟會對袁交涉，並非受袁收買而破壞革命。這段史實數年前沈雲龍在〈汪兆銘與袁世凱〉（《傳記文學》49卷5期）一文中曾有詳考未見作者引述。另一問題，是近來已有學者指出汪氏謀刺攝政王的地點，實係北京甘水橋南的小石板橋（見《民國春秋》1988年第2期），而本書的從銀錠橋舊說，不知有何根據。

\* 美國聖邁可學院

首見於張江裁「北京庚戌橋史考」，中國史蹟風土叢書，1943年5月

第三至五章指寫從國民黨改組到九一八事變期間之汪氏，這是他一生鋒芒畢露的全盛時代。本書在史實的舖陳上，有幾處似嫌草率。如 1925 年的汕頭會議和選舉國府主席，正式確立了汪氏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，其間縱橫捭闔的過程，可見於毛思誠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及湯良禮 *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* 等書（此二書均不見於附註），而作者卻輕輕帶過，放棄了一個探討汪氏政治手腕和國民黨內權力結構的大好機會。又如 1927 年底的廣州事變，孫發奎、黃琪翔以武力驅逐「桂系」在廣州的勢力，這是後來汪氏下野的導火線，而作者對此事究竟是否為汪氏主使，卻語焉不詳，更未說明汪氏及張、黃等人發動此事的可能動機及計畫。再如 1928 年「改組派」的成立，與當時汪、蔣之間，乃至汪、蔣、胡（包括「西山會議派」）之間的合縱連橫很有關係，《革命評論》之出版最初即受蔣氏津貼，此在陳公博《苦笑錄》中敘述甚詳，作者參考該書而未能點出這層關係，使這段時期一連串政治、軍事動亂的派系背景脈絡不清，十分可惜。

以上這些缺點多少總和本書的前半部太過簡略有關。從第七章「破壞抗戰暗中通敵」起，敘述即轉為詳細，此後數章顯然是全書的重點。作者過去曾編訂過多種有關汪氏在抗戰前後活動及汪政權的史料，如《周佛海日記》及刊載于《近代史資料》和《檔案與歷史》的函電、回憶錄等，對中日原始資料的掌握有甚嫻熟，在此書中也充分加以利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年前轟動一時的新發現史料《汪精衛日記》，見於本書附圖而不見於附註，是否因其用處有限，不得而知。

然而豐富的史料並未使作者的分析更為深入。本書在第六章中首次讀到汪氏的對日態度，當時尚在抗戰以前：「汪精衛贊同蔣介石的『攘外必先安內』的反共政策，因此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方針」（頁 199），此後即據此基調描寫，從未就汪氏的動機和國內外環境作任何闡發，僅在敘述中偶以「畏敵如虎」、「畏蒞、避事」等語形容，論據相當薄弱。在第七章中，作者指出汪氏對日妥協和堅持剿共的立場，與八國聯軍時清廷「寧贈友邦勿予家奴」的政策「一脈相承」，並謂汪氏成為漢奸賣國賊之「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」（頁 242），即在於此；這種不成為解釋的解釋，實無助於人們對汪氏或中國近代史的了解。

據此邏輯，汪氏在抗戰開始以後的「反對抗戰」和「倉皇出逃」，都是歷史的必然，反倒是蔣介石的態度為何在七七事變時發生一百八十度之轉變

而成爲堅決主戰派，顯得突兀。

1940年組織偽府以後，本書認爲汪氏及其黨羽便死心塌地的爲日本帝國主義者賣命，所有對日爭取更大自主權的努力，都只在「借以欺騙民眾，改變傀儡漢奸的形象」（頁468）而已；此說固有一定之真實性，但忽視了汪政權與日本之間既倚賴又衝突的微妙關係。自John Hunter Boyle的*China and Japan at War, 1937-1945*以來，西方學者對這種關係的探討頗有成績，本書均未採用。其實作者所編訂的《周佛海日記》中，有關線索便很多，大可參考。

「結束語」對汪氏一生提出三點總評：第一、汪氏「是一個應該徹底否定的反面歷史人物」（頁484），第二、汪氏的政治道路「是一條脫離人民、違背民意、背叛民族的道路」（頁486）；這兩點屬於政治評價，不必討論。第三、汪氏之墮落「並非偶然，是由他的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所決定的」（頁487）。作者強調汪氏早年受王陽明「心學」影響頗大，因此凡事爲「我」，造成唯我獨尊的領袖慾，這是他一切政治活動的基本動力。如果這就是作者在詳考汪氏生平後所得出的最主要結論，未免令人失望。研讀王陽明學說是否即會導致唯我獨尊的性格，已需商榷；而汪氏究竟受此學說影響多大（作者所引證據僅爲其《自述》中一段誦讀《傳習錄》的回憶），亦難斷言。更何況一領袖慾來解釋某一特定政治人物的行爲，說服力太低，自蔣介石、毛澤東以降，從政者無一不受領袖慾之驅使，然而各人成就際遇不同，可見關鍵不在於此。要想探討汪氏的政治，恐怕還得從民國時代派系政治的模式、中日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和戰關係，以及汪氏本身「浪漫衝動」和「現實妥協」的雙重性格等角度著手。二十多年前Howard L. Boorman有“Wang Ching-wei: China's Romantic Radical” (*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*, Dec. 1964)一文，二十多年來有關汪氏史料的發掘與整理繼有進展，而綜合性的分析評論，似無更上一層樓者，此不能不稱爲一大遺憾。

作者在「後記」中批評John Hunter Boyle對汪氏的研究時說：「博伊爾(Boyle)先生是美國人，他不了解中國人的感情，不理解中國人對汪精衛是何等的切齒痛恨。因此，他在承認汪精衛通敵的同時，卻又不免對汪表示了某種惋惜與同情。」（頁491）其實作爲一部傳記的作者，若不能對傳主產生「某種惋惜與同情」，而只有「切齒痛恨」，於冷靜持平的研究必有妨礙。這或許正是本書分析不夠深入的癥結所在。

體例方面，本書未附參考書目及索引，是大陸同類著作中常見的疏失。